

80年前,驻津日军签字投降

张新华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津,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北方大都会,曾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饱受摧残,也在胜利的曙光中见证了日军的最终投降。今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记住伤痛与耻辱,更是为了铭记天津人民坚韧不屈的抗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 屈辱岁月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等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此后,日本发动和参加了多次侵华战争。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和距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城市、中国北方的水陆交通贸易枢纽,拥有广阔的资源腹地,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在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阴谋中,天津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成为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工业基地、掠夺中国战略物资的中转港口。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两亿三千余万两白银的赔款,遂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剧膨胀,开始积极谋划并加入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中。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充当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锋。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军驻扎在海光寺,开始了长达45年的驻军历史。

1875年,日本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以后随着天津在日本侵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领事馆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成为日本控制华北地区的中枢。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断扩张。日本租界内设有警察署、宪兵队、居留民团等机构,以及以各种名义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之后,日军将天津视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兵站。1937年8月1日,日伪政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天津日伪政权以军事镇压为依托,从思想、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全力

沽上丛话
大悲禅院是天津名刹,历经沧桑变化,寺院内保存了不少佛教文物。2001年,我曾着重对寺院珍藏的佛教文物做了考察。据我所知,大悲禅院文物之精华主要是一批古代的佛教造像。当时寺院内藏有金铜、石刻、木雕、陶制佛像共计130件,雕造年代自南北朝、隋唐至明清不等。最大的石佛像高达1.5米,一些元、明、清铸造的鎏金佛像均价值非凡,其他石质、木质造像亦颇精美(不排除有部分后仿之品)。这些佛像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海关截留之物,后归入大悲禅院。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曾派人从中精选两件入藏于故宫博物院,余下的仍不乏精品。

目前,大悲禅院内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这里的明代佛教造像。明代是佛教造像人格化、世俗化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时代,情理并重的理想造型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年该寺院后殿供奉的千手观音像,系柏木雕成,表层镀纯金,金光照人,传为明代作品,可惜在特殊时期被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四)



宝物现身 大悲院

章用秀

殿。现今寺院中体量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当数念佛堂供奉的毗卢遮那像和释迦宝殿供奉的释迦牟尼像,两尊佛像均为明代所铸,可谓16世纪天津地区佛像铸造工艺的代表。

毗卢遮那,有时又作毗卢折那、毗卢舍那等,意为“光明遍照”“大日”等,是中国佛教寺院中常见的一尊佛像。对毗卢遮那,有不同的解释。天台宗将毗卢遮那作为法身佛,与卢舍那(报身佛)、释迦牟尼(应身佛)合为三身。法相宗亦主三身说,只是名称不同,他们把毗卢遮那佛作为自性身,以卢舍那佛为受用身,以释迦佛为化身。大悲禅院的这尊毗卢遮那佛高约1.8米,虽金色已褪,却更显古朴斑驳。其形象为头顶五佛宝冠,手结大智拳印,结跏趺坐于后配的莲台上。丰颐秀目,仪表堂堂,呈现出一种宁静与含蓄,为国内罕见的珍贵文物。以往有人将其断为唐代作品,甚至写入书中。根据其造型等特征,我认为其为明代所铸。北京来的专家看过,也说是明代作品。

释迦牟尼像通高5米,重约6吨,为国家二级文物。这尊巨像形体之大、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在全国均为罕见。释迦佛祖趺坐端坐,蓝色发髻作螺旋,桃状顶光凸起。左手掌展作愿心印,右手抬起,掌心面向殿门。面容端庄,雍容睿智,双目微启下视,眉宇弯弯如月,嘴角深沉含蓄,带有一种特有的安详、和平、慈爱而又静谧的微笑。这尊佛像原是供奉在静海县曹村的大佛寺的,后该寺院被毁,20世纪80年代初移至大悲禅院。

在大悲禅院的文物中,除了那些琳琅满目的古代铜、石造像外,还有几件藏品亦是弥足珍贵。其中,《大乘妙法莲华经》一函共九册,为明代宣德元年(1426)正月初一所制的手抄经卷,绘有《佛祖说法图》,精美绝伦,其上还有清朝同治年间一掌管盐务的官员在“龙山崖壁般若吉室”题写的序文。刻经紫砂钵,质地细腻古朴,周体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俗称《心经》),用行书书写,字体颇具二王神韵,系新加坡罗福盛居士在新加坡市肆用重金购得,于1993年奉献大悲禅院。经初步鉴定,为清光绪年间大悲禅院举行传授大戒仪式时的珍品。此外,大悲禅院还保存有元代擦擦、唐卡,以及李叔同早年在天津参加科举童生试的考试卷等,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南京受降仪式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划定了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16位高级将领出任受降主官,规定辖区内的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

在日军投降的时候,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已处在冀中、冀东、渤海三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天津地区此时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八路军也已经占据了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日本宣布投降后,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此时还远在广西。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下令城内日军和伪军不准向中国共产党部队投降,所以,当八路军准备进入天津城时,遭到了城内日军和伪军的疯狂抵抗。同时蒋介石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驻守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驻天津日军的投降。

■ 历史一刻

1945年8月13日和9月30日,蒋介石先后任命张廷谔、杜建时为天津市市长、副市长。10月3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平津地区为第十受降区,由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受降区司令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其中,在天津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团、第9独立旅团,日本投降代表为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他是日军在天津的最高指挥官,奉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投降。

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第一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其中4000人于10月1日进驻天津市区,在天津市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今和平区承德道12号)内办公,并与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会面,骆基中将带来了一份授权书,蒋介石授权美军接受驻天津日军的投降。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整,在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驻天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第十受降区受降主官孙连仲派出的受降代表吕文贞、时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张廷谔、时任副市长杜建时、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人参加了受降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宣布受降命令后,美国士兵押解着日本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走到签字台前,他们依次放下腰间的军刀,双手高高举起,低下头,将军刀放在桌上,以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内田银之助代表驻天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受降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被拘押在海光寺原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而其他6名日军军官被押往天津南货场战俘营羁押。至此,日本在天津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宣告结束。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题图为天津人民见证日军投降。

秋光里 飘着五谷的香

杨丽丽



秋一深,空气里就漫开一种稠得化不开的香。不若春花的浓烈,也不若夏荷的清冽,是一种带着烟火气的、暖融融的香——五谷在阳光下晒透了,把整个季节的饱满都酿成了这缕人间味道。

村后的稻田该收割了,远远望去,一片金黄,像铺了块巨大的金丝毯,风一吹,“毯”上就起了波纹,哗啦啦的,像稻穗在说话。农人们戴着草帽,看收割机把大片大片的稻子揽进怀里。偶尔有稻谷从稻穗上掉下来,落在泥地里,农人也不捡,笑着说:“给土地留些,明年它还会还给我们。”我站在田埂上,看阳光落在稻穗上,每一粒稻谷都闪着光,像撒了把碎钻。凑近一闻,稻花香还没散,混着新土的气味,飘散出最朴实的秋味。

打谷场边的糜子也黄了。糜子秆儿比我还高,顶着红褐色的穗子,风一吹就晃一晃,像一串串小灯笼。父亲把糜子捆成垛,码得整整齐齐,说要等个好天儿脱粒。我躺在糜子垛上看天,天特别高,特别蓝,云走得很慢,像被谁用线牵着。有时候会有鸟群飞过,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说“该收粮啦,该收粮啦”。

最热闹的是晒豆子。黄豆、绿豆、红豆,母亲把它们摊在苇席上,摊得薄薄一层,让太阳好好晒着。豆子在席子上滚来滚去,偶尔有几颗滚到地上,我就追着捡,捡满一小捧就交给母亲。母亲笑着摸我的头:“攒着,等冬天给你煮豆子饭。”

玉米是最后收的。玉米秸还青着的时候,玉米棒子就已经鼓得发亮,外皮裹着几层绿衣,剥开来一看,玉米粒像排列整齐的金珠子,咬一口脆生生的,带着点儿甜。我和弟弟常比赛掰玉米,谁掰得多谁就能先吃煮玉米。玉米秸被砍下来,捆成捆儿立在田里,像一个个稻草人,守着空荡荡的地,等着明年再长新苗。

邻居张奶奶家在晒红薯干儿。她把煮熟的红薯切成长条,摆在竹筛里,放在院子里的晒架上。红薯条晒得半干时,会渗出些糖霜,亮晶晶的,勾得人直想咬一口。张奶奶见我盯着看,笑着递过一根,“尝尝,自家种的红薯,甜得很”。我接过来,咬一口,软糯香甜,甜汁在嘴里化开,暖到了心里。“今年红薯收得多,晒些红薯干儿,冬天给孩子们当小零食。”张奶奶说这话时,眼睛眯成了缝儿,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五谷丰登的甜。

傍晚的打谷场最是热闹。父亲和几个叔叔扛着木锨,把晒透的稻谷往麻袋里装,“哗啦啦”的声响,像秋姑娘在唱歌。母亲们则围坐在场边的老槐树下,一边摘着新收的棉花,一边聊着家常,手里的棉桃炸开白绒,落在衣襟上,像沾了层细雪。我和弟弟提着小竹篮,在谷堆旁拾捡散落的谷粒,偶尔抓起一把谷子往天上撒,金黄的颗粒穿过夕阳,落在地上,引得大人們笑着嗔怪:“慢些,别糟践了粮食。”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原来古人说的“岁稔年丰”,从来不是书本里的字眼儿,而是田埂上弯腰的身影,是晒场上滚动的豆子,是日子一寸寸攒起来的安稳,是藏在烟火里,最踏实最幸福的模样。

茶伴中秋守团圆

房小玲



中秋节,案头少不了一壶清茶相伴。茶烟袅袅升腾,与月华缠绵绕绕,织成一缕无形的丝线,串联起千年时光里的团圆与思念。

唐人虽未将中秋定为法定佳节,却早把“以茶祭月”的心意融进了农历八月中。陆羽《茶经》有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至大唐,茶已从药饮、饮食蜕变为文化之饮。彼时团茶圆润如月,被雅称为“月团”,恰与天上玉盘遥相呼应。碾茶成末,以沸水冲之,佐以椒盐姜桂,茶香便在月色中氤氲入人间与天界的对话。这种带着仪式感的饮茶方式,是古人对宇宙秩序的虔诚摹写,即以圆茶敬圆月,以地上之圆呼应天上之圆,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寄托着“月圆人圆”的深意。

宋人将中秋定为节日,茶与月的文化联结愈加深厚。文人雅士的中秋茶会,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王禹偁以“圆如三秋皓月轮”喻茶,苏轼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诗句,将茶饼当

成了能捧在手心里的月亮。这种物我相融的诗意图象,正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生动体现。宋人品茶赏月,品的不仅是茶的滋味,更是天地精神与个人情怀的交融。月色澄明,茶汤清澈,人心亦澄净如洗。在这三重澄明之中,文人以茶观照内心,以月凝视宇宙,完成了精神上的飞升与回归。

明人革故鼎新,废团茶兴散茶,中秋饮茶之风反而更入寻常百姓家。不再拘泥于繁复的仪式,只需一撮散茶,一壶沸水,便可于自家庭院对月独酌或聚饮。这种变革看似褪去了风雅外衣,实则让茶与月的对话更加真切自然。张源《茶录》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明月无需购买,清茶寻常可得,这种平民化的风雅,才是中秋精神真正扎根于泥土的体现。

及至现代,中秋茶事更添几分人间温情。月饼甜腻,茶能解之;乡愁苦涩,茶能慰之。各地茶俗异彩纷呈:苏州人爱以碧螺春佐鲜肉月饼,北京人则惯用香片配自来红……茶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每次读到杜甫的这首诗,我除了充满敬意,更多的是悲伤,那么伟大的一个诗人,一直在为房子喊,为饥饿喊,为多病喊,这是诗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不幸?

成都人很早就给杜甫建了一处草堂,那地方杜甫住过,历史上草堂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今天的杜甫草堂绝对是成都一个家喻户晓的地名,那是杜甫在成都永远的家,那是诗歌的家。

杜甫诗写得好,人却没有赶上好时候。年轻时科举落榜。中年时混到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相当于兵器库管理员。安史之乱后做了司功参军,本来已经够惨了,又碰上兵乱,对仕途感到失望,干脆辞职到处投亲靠友。杜甫自己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浣花溪边,黄土筑起的草屋,我所知道的杜甫从来没有阔气过,他修不起更有规模、更有气势的宅院。

杜甫最早修建的家园也许是我在脑海中想象出的那方家园。杜甫今天的家园是成都人给他修建的,不是几亩,是几百亩。杜甫先生那个时代,草堂以及草堂附近的地块应是城郊野地,现在这方土地已在成都二环之内,每一寸土地都“流金淌银”。

最早的杜甫草堂应该只有一道门,今天的杜甫草堂有东西南北四道大门,“天府之国”不辜负任何一粒种子,杜甫草堂是一粒种子,诗歌也是一粒种子,这是长大的杜甫草堂,这是生长着诗歌的“天府之国”。

不管从哪道大门走向杜甫草堂,成都人都在为我们的主人杜甫出场作出铺垫。不是随意地建造,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主人公杜甫的出场。

大雅堂是必须要记录的。“大雅堂”之名源自《诗经》,“大雅堂”的主角自然是杜甫,正面墙壁上镶嵌着一幅面积达64平方米的磨漆壁画,成都人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幅磨漆壁画。壁画以连环组合的方式,用生动的画面展示出杜甫一生最主要的阶段,譬如困顿长安,譬如遭乱流离,譬如寓居成都,譬如羁留夔府,譬如漂泊湖湘。壁画在“画说”杜甫一生最主要时段的同时,也不忘“诗说”杜甫的诗,在有限的画面内形象地展示出《望岳》《秋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代表作。

“大雅堂”也给杜甫草堂请来很多重量级嘉宾,用时下最时髦的话说,是给杜甫建立的“朋友圈”。浪漫不羁的李白自然是请来的。杜甫是见过李白的,杜甫给李白写过很多诗,而且一直在追寻李白走过的足迹,追寻李白写诗的地方,去致敬他仰望的诗人。有人说杜甫一生漂泊,投亲靠友是漂泊的路线,追寻李白的足迹是潜藏致敬的路线。

我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那是评论家的专业术语。用我们民间的大实话,杜甫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苦难的诗人。

千诗碑是必须要记录的。在草堂博物馆与浣花溪片区,以诗圣广场为起点,书法家把杜甫1455首诗刻写在山东青石之上,形成一道长310米的碑廊。溪水的声音传来,那是浣花溪的水声,杜甫草堂到了。轻轻推开那扇略显斑驳的柴门,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大唐盛衰、一个一生都在漂泊的诗人心灵深处的时光之门。这是一方宁静而古朴的庭院,那些直插云天的大树不知道是不是杜甫当年种下的,年轮记着一切。茅屋的屋顶,茅草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那风,杜甫吹过。这路,杜甫走过。这地方,杜甫住过。诗在,草堂永远就在。一个伟大的诗人住过后,这就是地球上最有辨识度的茅草屋。

我们今天见到的茅草屋不是杜甫最早住过的那茅草屋。但不管茅草屋被毁过多少次,重建过多少次,这儿的确住过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在那里写了很多伟大的诗篇。

杜甫一生不是在漂泊,就是在去漂泊的路上。在杜甫漫漫的漂泊路上,在四川的五年零五个月,在成都的三年零九个月,是杜甫一生中相对比较安稳的岁月。唐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家从甘肃同谷县,经蜀道漂泊到成都,最初借宿于浣花溪畔一间古寺中。杜甫一家在漂泊中,住过很多次古寺。第二年春天,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给杜甫批了土地。建造房子和院子所需的松、楠、竹及其他植物和材料,杜甫都是写信或赠诗向其他官员朋友索讨得来的。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来到杜甫做客的人很多,院子里,茅草屋,到处站满了人。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甚至连走路的脚步声都很轻。这个由时间与诗歌层层夯筑的“家”,早已超过黄土和茅草的范畴。这是我们用脚丈量的敬仰,用目光擦拭的丰碑——我们无法逆转他“床头屋漏无干处”的寒夜,无法为他“万里悲秋常作客”送去暖心的问候,那就让时光和我们的敬仰生长出参天的楠木、激滟的潭水、如海的修竹,为杜甫重建一座不朽的广厦,回应那穿越时空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的呐喊在杜甫草堂变为了现实,我们今天为杜甫置办了偌大的家业。时光走到今天,成都人给杜甫修建了这么大一片草堂。杜甫曾经的呐喊在神州大地上变成了现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只要我们啰嗦,多勤快啰啰嗦,不